

晚明时期的戮番冤案



魏忠贤(资料图片)

魏忠贤擅政的短短几年，无疑是明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凭借着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东厂官旗等事权，倒行逆施，为剪除异己不惜恣意罗织罪状、大兴冤狱。“戮番案”就是其中一例。

关于“戮番”一名，史籍均未做解释。很明显，这里的“番”，指的是明代东厂专事缉捕罪犯的差役，通常叫做“番役”或“番子”。而“戮番”仅偶然见之于奏疏，如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的“广布戮番，托名访缉，彼贪功罔利者，大都捉影捕风”（明朱长祚《玉镜新潭》卷6）；又如刑部衙门的“制削九卿科道，缄口吞声，广布戮番，四处捉打事件”（同上，卷9）。据此可以看出，它只是番役、番子的另一种称谓罢了。

介绍戮番案，不得不谈到此前发生的另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史称“诗帖案”，但确切些说，应名之曰“诗帖案”。戮番案与诗帖案涉及多人，其主要受害者则是刘铎。

刘铎，字我以，又字洞初，江西庐陵人，擅才藻，收入《来复斋集》十卷的诗文，足以表明他的文名决非浪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已44岁，殿试那天，因饮酒过量，对策书写越幅，以致挤占了读卷诸臣题写职衔姓名的位置，被抑置二甲。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

宦游京师假日多，也许是有着一层同乡关系的缘故吧，刘铎与位于积庆坊的旃檀寺吉安籍僧人本福时有往来。他善书法，曾应求为本福写扇面数幅，当时未带印章，事后再差家人拿去补用。不想这一小小疏忽，竟给他带来了麻烦。本福不但将印章补盖于刘铎写的扇面上，而且在“罗浮道民”署题诗作的拜帖纸上也加钤了刘铎的私章。

拜帖纸上的题诗凡三首。其中一首是五律，名《冬至遇雪》，诗云：“鬱樟禾边崇，山前鸟欲飞。各人头戴笠，百执项流纬。阳至（一作扬）城君恩重，阴来（一作霾）国事非。崇祯明圣出，大木好垂衣。”（清谈迁《国榷》卷87）另外两首已难详考，晚明时的内监刘若愚只记得“诗句内有‘弹射’‘逐臣’等字样”（《酌中志》卷11）。

罗浮道民是欧阳晖的号，他字伯羲，又字什之，广东从化人，任顺天府香河知县期间也常到旃檀寺中走动，本福遂成其方外之交。题诗时，他正由户部主事贬官南京锦衣卫知事，内心的怨望不免流露于字里行间。

刘铎对此并不知晓，于天启五年（1625年）秋离京赴扬州当知府去了。

同年十一月，锦衣卫缉事侦查到本福糊在居室壁上的这几张钤有刘铎印章的诗帖，随即揭下诗帖，拘捕了本福。锦衣卫都督田尔耕请来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和刑科给事中霍维华，一起仔细研读，认定诗中“阴来国事非”句分明是刘铎不满朝政，讥讽魏忠贤。他不敢怠慢，立刻报闻。在御史倪文煥的怂恿下，魏忠贤矫旨派锦衣卫百户傅德相前往扬州扭解刘铎来京，与本福面质。刘铎到任数月，已初见政绩，数百士民为之叩阍求宽。这当然感化不了奉差的锦衣卫校尉。

二

在镇抚司狱，刘铎遇到了监候待决的李承恩和方震孺。他们都是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关在此的。

与他关在同一监房的李承恩生于戚畹之家，是世宗第三女宁安大长公主的长子，袭父李封爵为左都督，天启中官驸马都尉。他家拥有一处名闻京师的亭园；魏忠贤垂涎已久，一度托人登门索要，遭到拒绝，便于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以私藏违禁器物罪，投诸镇抚司狱。尽管抄出的团龙服、龙凤女衫、金面寿喜龙盒等皆系世宗所赐，然而刑部仍引盗乘舆服御物律，拟斩。

方震孺关在他们隔壁的监房。他字孩未，号念道人，南直隶寿州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天启初官湖广道御史，论梃击、移宫功罪；疏陈三朝艰危，请逐魏忠贤；荐举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巡视南城时，魏忠贤甥傅应星强夺民妻，方震孺秉公理案，下之狱，由此埋下了祸根。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魏忠贤嗾户科给事中郭兴治追论已经罢官家居的方震孺监军辽东时党庇熊廷弼，失陷封疆罪，且坐赃6400两，系狱拟绞。

相似的际遇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三人甚是投缘，囚中的日子倒也并不寂寞。经过几次提审，诗帖案的案情逐渐明朗。刘铎和本福都声称拜帖纸上那三首诗俱系欧阳晖所作并书；刘铎的私章为本福擅用。这从诗帖本身得到了证实：一、诗帖落款罗浮道民之“罗浮”是广东省名，欧阳晖籍贯广东，刘铎则为江西人；二、诗中“弹射”“逐臣”等语，与欧阳晖之降调相吻合，刘铎外转，由正五品的司官而至正四品黄堂，乃是升迁。在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二十日到案的欧阳晖也均予招承，诗帖确与刘铎无关。

此案移送刑部定谳时，左侍郎沈演明确表示：“圣朝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讵宜以将无同之字迹，成莫须有之罪案。”（史外《刘太僕传》）执意不予议罪。另外，“（刘）铎雅善忠贤子（误，应为侄）良卿，事获解”（《明史·刘铎传》）。

至四月二十一日，这个荒唐的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欧阳晖判杖一百，削籍为民；本福以诬陷罪杖一百，流三千里；刘铎则无罪释放，待次京师等候复官。可是使刘铎始料未及的是，可怕的厄运正在向他步步逼近。

三

刘铎获释后，魏良卿曾私下里问他：“‘囊锦衣往逮，索金几何？’曰：‘三千耳。’”（同上）在魏良卿的干预下，傅德很快悉数奉还了银两。然而时隔不久，正是这位傅德自称侦查到了李承恩在狱中重金贿求刘铎、方震孺居间为他营免之事，一纸揭帖向东厂告发。出狱才两月左右的刘铎，于当年闰六月

再度进了刑部大牢。

刘铎、方震孺居间一说，主要来源于东厂的题本。据称，李承恩嘱其子李瑞以宁安大长公主的金册玉带为贿，刘铎一方面买通刑部郎中翟师偃、李陞、冯士榘及书办史大仁等；另一方面通过御史温国奇直达于刑部尚书徐兆魁。

徐兆魁则矢口否认自己受过请托。他奏辩说：“忽见厂疏之款，谓……犯官李承恩重货营脱，方震孺、刘铎托温国奇曾向臣求宽，何异风马牛不相及也。”自己是清白的，“夫书吏之玩法，司官之过也；司官之不净，臣之责也。乞先罢臣而后勘实”（《明熹宗实录》卷73）。三法司有没有“勘实”，不得而知，但在七月间，被厂疏点名的那些官员果然一一遭到罢斥。徐兆魁与温国奇被勒令冠带闲住；翟师偃、李陞、冯士榘俱削籍除命；史大仁、李瑞遭戍。为诗帖案说了几句公道话的沈演同样未能幸免，由于“开报舛错”，即一通奏疏“前后语言辗转支吾”（同上）而被革了职。

接任刑部尚书的是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薛贞，他似乎更善于揣摩魏忠贤的心思。改组后的刑部是更听使唤了，但是，使魏忠贤心有未甘的是，单凭这居间罪仍无法置刘铎于死地。

四

同年八月，机会出现了。

初二那天，刘铎的家人刘福携带二百五十两银子从彰义门进入京师。无业游民赵三等见他行囊沉甸甸的，又是单身一人，顿起歹念，假冒番役挟诈了一百五十两。刘铎的亲戚吉安府龙泉县籍监生彭文炳具状告至南城兵马司。巡捕营把总谷应选随差番役孙守贵将刘福、赵三等人一并捉拿到官，并报告参将张体乾。

张体乾知道魏忠贤素恨刘铎，为献媚邀功，便对刘福使用非刑，苦苦拷逼。当听刘福说起同年四月间，刘铎出狱后其妾曾为之斋醮谢神祈福时，不觉大喜过望，忙找来谷应选。谷应选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的侄婿，很有背景，张体乾一向视为心腹。两人一番谋划后，张体乾捏造出刘铎获释后延请道士方景阳用巫术咒害魏忠贤的情节，迫使刘福照此供述；还假意请东厂刑官处派员同审，实际是向魏忠贤通报消息。而谷应选则依从布置，前去缉拿道士方景阳、假官曾云龙、彭文炳与其家人辛云等一千“涉案人犯”，及用于行刑的符篆、令牌、牒文、黄纸诸项“赃证”。方景阳与刘铎素昧平生，只因受不了惨酷的打问，被逼低头认罪。

一个“神奸贿嘱左道，术害重臣”（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21）的冤狱就这样从无到有在瞬息之间生成。

初六，张体乾将此案具疏奏闻。刘铎、方景阳等奉旨由锦衣卫绑送镇抚司严行究问。十一日又移送刑部从重拟罪。与此同时，张体乾、谷应选以“缉捕有功”俱获升赏。

刑部并未按程序审理此案，更没有让刘铎同方景阳当堂面质。任尚书薛贞主持下，刑部郎中高默会同湖广司员外郎徐日葵、福建司主事陈震豪、山东司主事汤本沛仅根据已录的供词，就酌定了“书符咒水左道”的罪名，为首者刘铎拟绞，秋后处决；方景阳不胜刑讯暴毙于狱，免议；曾云龙、彭文炳、刘

福按从者减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辛云依不应事理，减等杖罪。

在刑部大堂，被拷打得体无完肤的刘铎还在厉声责问，薛贞冷冷地说：“当今之时，以己功名为重耳，他人生死何与己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1）刘铎反驳说：“一时功名易尽，千秋公论难逃！”（《明熹宗实录》卷73）薛贞无言以对，重笞刘铎二十大板，以此来挽回庙堂执法官的脸面。

在常人看来，刑部已是昧着良心强加了重罪，但这依然未能达到魏忠贤的要求。二十一日的“圣谕”仍嫌刑部拟罪过轻，驳回再审；高默等几位司官也受到了“不遵堂批，徇情卖法，本当处治”（《颂天胪笔》卷21）的严重警告。

魏忠贤可以说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他伴随皇上蛰居深宫，谁也说不清圣谕所传递的究竟是皇上的旨意还是魏忠贤的话语。薛贞当然不敢稍有违拗，免得重蹈前任徐兆魁的覆辙。自己位居正二品的显职，不正是攀附夤缘、仰其鼻息的一种回报吗？且保眼前富贵，休管身后是非！想到这些，薛贞心安理得地责令高默等原班人员再议。司官们承受不了“圣谕”和本部堂官的双重压力，遂依卑幼谋杀尊长律，拟刘铎斩决不待时；依书符咒水左道律，拟曾云龙、彭文炳、刘福绞刑；辛云遭戍，方景阳戮尸。

例行手续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二十七日，刑部具题呈复；拟罪允当，依拟会官处决的御批随后就送达刑部；二十八日，刘铎等四人被押赴西市行刑。而审理此案的高默、徐日葵、陈振豪、汤本沛也都降三级调外。一起关涉到连方景阳在内共五条人命、十余名官员被削夺降调的冤案至此匆匆收场了，历时仅二十二天。

同刘铎相比，方震孺要幸运得多。河西赃私案的赃银追缴未完，又被诬在居间案中受李承恩三百两银子，罪上加罪，坐大辟，秋后处决。但这年十月，适逢皇极殿重建竣工，熹宗下诏停刑，他才得以逃过此劫活了下来。后官至右金都御史、巡抚广西。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忧愤而死，年六十一岁。

刘铎的另一位难友欧阳晖倒也是有情有义的人。他始终认为刘铎的牢狱之灾是由自己引起的，深感愧疚与自责。出狱后回到原籍，一直郁郁寡欢。当他听到刘铎的死讯，便辞别家人，赴飞来峡投水以殉。

五

就在刘铎受刑一年后，即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年方二十三岁的熹宗皇帝死去。十一月，魏忠贤在发配凤阳途中自缢于阜城尤氏邸舍。元凶既除，党羽星散。嗣位未久的庄烈帝开始着手平反冤狱。

戮番一案最先由刑部江西清吏司提出。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姚珰杀人，一手策划制造这起冤案的主犯张体乾依诬告反坐律，斩不待时；参与策划、伪造证据的共犯谷应选依诬告他人致死律，秋后绞决。两人于崇祯元年（1628年）先后正法。原刑部尚书薛贞在这年十一月被逮拟辟，至四年（1631年）九月病死狱中。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戮番案的责任人一一抵罪伏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案的主要受害者刘铎也得到了昭雪，获赠太仆寺少卿。历史终于还了他一个“千秋公论”。（赵承中 来源：文史知识）

剩男剩女宋朝盛产

当下对大龄单身男女青年各有一个称呼——剩男、剩女。其实，远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早已是剩男铺天盖地，剩女漫山遍野了，全国各地的单身男女比比皆是，即使没有朝廷的大力号召，他们都很自觉地晚婚晚育，而且不搞同居，堪称一大历史奇观。

难道那时的无婚主义已经十分盛行？当然不是，说到底一切都是科举惹的祸。如果说唐朝是婚外恋者的天堂，明朝是文痞的天堂，那么宋朝就是读书人的天堂。

读书男忙考试“失时”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宋朝是建立在换皇帝比女人换发型还频繁的五代十国的废墟上，许多皇帝还没把龙椅坐热乎就被武人们给咔嚓了，而且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所以老赵从心眼里深深地对习武之人感到了威胁。相反，读书之人整天跟当时没有标点的文字打交道，浑身上下只有一根舌头最有杀伤力，再怎么折腾也能溅出点唾沫星子淹死两个心脏病，万万没有能力推翻老赵家的江山的。因此，老赵大量地重用文人。首先，宋朝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把公务员的工资拉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最高点，而且逢年过节大发福利，碰上三伏数九还有额外的劳保。其次，宋朝有了高薪待遇，却没有严厉的监督惩罚体系，事实上宋朝的国策还对官员的腐化持纵容态度，即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官员犯了法也不会有过重的刑罚。再次，宋朝的官员数量异常庞大，常常一个官位有三个人同时担任，这样就为更多的读书人进入官场提供了便利。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朝的文官比武官地位高。

好东西不用做广告，宋朝的官员生活如此安逸，天下的男人自然不能放过，于是耕田的啃书本，磨豆腐的啃书本，开茶馆的也啃书本。一时间，四书、五书、盗版书、书书畅销；文人、粗人、老年人、人人科举。男人们都把金榜题名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那时的口号是“先立业，后成家”，只要考中了进士，面包便会有，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是，宋朝的乌纱帽就算再多，也经不起全天下的男人去抢，成功的永远是极少数。由于男人们都在忙考试，看见书比看见杨贵妃还美，这就造成了许多男子“壮年未娶”，一个个都成了剩男。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有个杭州举子中第时已经年过70岁，友人风趣地祝贺

（朱英 来源：意林）

古代一两银子值多少

史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现在的94.4公斤。现在中国一般家庭吃的大米一斤在1.5元至2元之间，以中间价1.75元计算，可以算出明朝一两银子合人民币660.8元。唐太宗贞观年间，一

斗米只卖5文钱，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钱（又称一贯），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玄宗开元年间通货膨胀，米价涨到10文一斗，尽管如此，一两银子依然抵现在的数千元人民币。

（佚名 来源：国际金融报）

“钱”姓为何排第二

北宋时期产生了一部《百家姓》。赵氏列第一，因为赵匡胤是皇帝。而在当时人数不多的钱氏为何排在第二呢？据说当年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由于吴越富庶强盛未灭亡。

面对赵匡胤强大的兵力，吴越国国王钱某的孙子钱弘，为了使生产力不遭破坏，生灵

（李莉 来源：老年日报）